

科技与社会

未曾问世的《明史记》

宁晓玉

摘要 《明史记》是一部未完成也未曾问世的史学著作。本文旨在梳理这部史书编纂的缘起、过程和最后的命运，重点叙述了吴炎、潘耒为编纂《明史记》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包括吴、潘二人与钱谦益的书信辩难，以及钱谦益和顾炎武对《明史记》所给予的期望和帮助。康熙初年的“庄氏史狱”给《明史记》的编纂带来了致命打击，本文也叙述了吴潘二人受其牵连而惨死的过程，王锡闳和顾炎武对两位挚友的哀悼。最后则探讨了潘耒的异母弟不顾众多师友的规劝入明史馆参修明史原因和王锡闳等人对《明史记》遗稿的保存和整理等事。

关键词 《明史记》 吴炎 潘耒 王锡闳 顾炎武

《明史记》是明遗民吴炎、潘耒仿效司马迁《史记》编撰的明朝史书。这部史书没有最终完成，完成的部分（约占全书十之七八）也遭到了毁损，只剩部分残稿保留在王锡闳和吕留良家里，现在是否有流传尚不清楚。在《明史记》编纂过程中，除了吴炎、潘耒两位主要作者之外，惊隐诗社的王锡闳、戴笠、顾炎武、陈济生等都曾经参与，他们有的撰写部分章节，有的贡献家中藏书。关于《明史记》，现在已经有些研究。[展龙、耿勇 2011；杨绪敏 2012] 本文旨在围绕《明史记》讲述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一个明遗民们努力保留故国记忆的故事。它开始于明末士大夫编纂本朝正史，接下去是明遗民吴炎、潘耒以个人之力编纂《明史记》，其次是王锡闳、吕留良冒死保存、整理友人残稿，最后是潘耒不顾众师友的劝阻出仕清朝，入史馆纂修《明史》。这样一个枝枝蔓蔓，跨越明末清初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故事也许对理解遗民们的家国情怀与他们的史学研究有些帮助。

作者简介：宁晓玉，女，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明实录》的流布与明朝修本朝史

明代只修实录，不修起居注、日历，也不修国史[杜维运2010，页683]，这大约是当时的一般情况。顾炎武早年在祖父的影响下，对本朝史事也曾十分留意，因此对其发展情况也颇为解，他说：

先朝之史，皆天子之大臣与侍从之官承命为之，而世莫得见。其藏书之所，曰“皇史宬”，每一帝崩，修《实录》，则请前一朝之书出之，以相对勘，非是莫得见者。人间所传，止有《太祖实录》。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正德以后，始有纂为一书，附于野史者，大抵草泽之所闻，与事实绝远，而反行于世。世之不见《实录》者，从而信之。万历中，天子荡然无讳，于是《实录》稍稍传写流布。至于光宗，而十六朝之事具全。然其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以是野史日盛，而谬悠之谈遍于海内。[顾炎武1983，页114]

在顾炎武看来，《明实录》秘藏深宫和人不敢言朝廷事是造成明代史学费失的两大原因。万历年间《明实录》从宫廷流向民间，这有力地刺激了明清之际私家修史的兴盛。吴炎、潘耒二人后来修《明史记》，靠得就是潘耒章不惜重金购买的《明实录》。另外二人修史也与明末当代史学研究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明实录的流布和明朝修本朝史的大致情况略述一二^①。

正如顾炎武所言，明初期的《实录》只有正副两本，只可在宫中阅读，严禁传抄。嘉靖朝，《实录》有了私人抄本，珍藏于个别首辅之家，只有极少数文人靠个人关系才有机会一睹真容。万历年间，《实录》被大规模的传抄并从宫廷流向了民间。造成《实录》传抄和流布起因大概源于两件事情。一是万历16年(1588)，神宗皇帝想阅读本朝《实录》，由于“皇史宬”的《实录》，卷帙浩繁，不便阅览，首辅申时行建议抄录简化版的《实录》供皇帝阅读。于是那些负责抄录、校对和誊写的官员乘机抄录副本，夹带出宫，其他人再辗转传抄，以致当时传抄《实录》者“遍及台省”[钱茂伟1994，页60]。另外一件起因于朝廷组织过的一次不太成功的修本朝史的活动。万历22年(1594)，皇帝听取礼部尚书陈于陞的意见，诏令开馆修本朝正史，《实录》被取出供史臣参考。这次修史由首辅王锡爵等上《事宜》，对修史的人员、资料搜集、分任责成做了具体的安排，此后还相继任命了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选，同年8月开史馆纂修正史。此事谈迁在《国榷》和《枣

^① 详细可参看钱茂伟的系列文章。

林杂俎·艺赞·陈于陞修史》都有记录[钱茂伟、柴伟梁 2006, 页 4-5]。修史活动由于乾清宫失火烧毁了部分《实录》、陈于陞病卒以及皇极等殿失火而被叫停。《史概》的作者朱国祯就曾经参与了这次修史活动, 后来因病休息了三个月, 等病好后再回到史馆, 就再没有人提这件事了。《史概》后来成为庄廷鑑编写《明史辑略》的底本, 由此引发了庄氏史狱, 导致吴、潘二人被杀, 此是后话。

朝廷修史无果而终, 民间修史的热情到被大大激发了出来, 一时间从首辅到近臣, 从商人到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诸生, 甚至于宦官都参与这场热闹的修史活动, 真可谓“家期马班, 人各操觚”。修史活动虽然被叫停, 但是被烧毁的《实录》还需组织人力补抄完整, 于是抄写官员再次乘机雇人抄写副本。抄出来的《实录》还被再次转抄, 公开销售, 当时北京的书店就有《实录》抄本售卖, 晚明京师的官绅, 江南的富商巨贾, 有不少购买了《实录》, 其中就包括潘恂章。到万历四十五年前后, 社会上流传的《实录》抄本就更多了。《实录》的流传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史料资源, 这一时期编纂的私家史书不可胜数, 全祖望说明季野史, 不下千家。如果仅就明末写就的本朝史做不完全统计, 大约有 200 种, 还不包括杂史、笔记、地方性人物传记、学术史著作等。[钱茂伟 1994]

二 《明史记》的编纂

入清以后, 明史编纂的热情丝毫不见消减, 谈迁的编年体巨著《国榷》, 张岱仿《史记》体例写成的《石匮书》, 庄廷鑑编纂的《明史辑略》和查继佐的《罪惟录》, 都是一时之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由明入清的明史编纂是一个简单的前承后继的关系, 明清鼎革的社会巨变是其转折点, 由此编史人的身份地位、人生态度、编史目的陡然发生了变化。明清剧变让多数读书人成了前朝遗民, 部分人发奋作史已不再是为了“有鉴于往事, 以资于治道”, 而是为了保存故国记忆, 是对消逝了的晚明生活的慨叹, 是一代学人的反思与忏悔, 更是对新建清王朝的一种拒斥与反抗。这为遗民编史定下了基调。吴炎、潘恂章的《明史记》就是这个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史学成果。

吴炎和潘恂章俱出身吴江名门。吴炎的从叔父吴扶九是复社的创始人之一, 其他叔父吴振远、东篱(宗潜)、南村(宗汉)、西山(宗泌)、北窗(吴宗)等“兄弟七人并有辞藻, 而宗潜与弟宗汉、宗泌尤知名”^①。潘恂章和父亲潘凯都是复社

^① 陈和志、沈彤清.《乾隆震泽县志》.卷十八“节义”.

中人。潘凯字仲和，号贻令，明诸生，“高才积学”，娶吴江县令章日价之女为妻，生潘恂章[吴山嘉 1990，页 32]。吴炎和潘恂章二人互有耳闻大约是在崇祯 12 年(1639)，那时吴炎随叔父吴宗汉到笠泽王锡阐家做客，而潘恂章则跟随父亲潘凯也在笠泽镇南的吴氏康庄做客，两地相距二里多路。父辈之间的往来与交谈使得两位少年彼此听说了名字，其时并未谋面。三年后，也就是崇祯 15 年(1642)，吴、潘才得以相见，二人一见倾心，引为知己。崇祯 17 年“甲申之变”，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南京的弘光政权在清军铁骑之下也没有维持多久，到是一些有志气的士人纷纷组织起来，对清军的征服进行了反抗。反抗最激烈并且颇有成效的是乙酉、丙戌年间(1645-1646)吴易、孙兆奎领导的抗清斗争，起义军一度攻占了吴江县城。吴炎的叔父吴振远率兄弟七人参与了这场斗争。斗争失败后吴振远被杀(1646 年)，吴氏兄弟中的幸存者逃到唐湖叶桓奏家中藏匿，顺治 4 年(1647)，叶桓奏、吴宗潜、吴宗汉及其他吴氏兄弟在叶家的古风庄结盟立社，成立“逃之盟”、“逃之社”或者“惊隐诗社^①”。后来其他抗清斗争的幸存者，如顾炎武、归庄等人也陆续加入，社团兴盛时，约有五十多人，俨然成为东南大社。吴炎、潘恂章、王锡阐、戴笠、顾炎武、陈济生都是社中人，他们与《明史记》多多少少都有些关系。因此，说编纂《明史记》是惊隐诗社成员共同的事业也不为过。

“惊隐诗社”成立的同一年，吴炎迁居莺湖，莺湖原是潘恂章的故居所在。虽然潘氏此时已经退隐韭溪别业，但因时时需要返回莺湖探望母亲，所以得便拜访吴炎。由此吴潘两人之间的来往日益增多，关系日近，如果潘恂章四五日不来，吴炎则会驾舟前往探望。一日，两人酒酣之时，潘恂章言及自己不甘心老于诗词章句之中，吴炎劝慰老友诗词不可骤废，并谓“诗亡而春秋作。则诗者，盛周之史；而春秋者，衰周之诗也”。潘恂章一方面听取好友的规劝，一方面提出要为亡明修史的宏图大愿，他说：

明兴三百年间，圣君贤辅、王侯外戚、忠臣义士、名将循吏、孝子节妇、儒林文苑之伦；天官郊祀、礼乐制度、兵刑律历之属，粲然与三代比隆。而学士大夫，上不能为太史公叙述论列，成一家言；次不能为唐山夫人者流，被之声韵，鼓吹风雅。独两人故在，且幸未老，以为不此之任，而谁任之？^②

^① 现在一般认为惊隐诗社的成立时间是 1650 年，如谢国桢之《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与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根据的史料是乾隆《震泽县志》和杨凤苞《秋室集》“书南山草堂遗集后”。本文根据吴炎《潘子今乐府序》中的时间线索取 1647 年，杜维运在《清代史学与史家》里对这些时间节点的研究，将诗社成立时间定在了 1648 年。总之不会晚至 1650 年。以常情论，起义失败后四年再创立“逃之盟”可能性相对也会小些。

^② 吴炎·“潘子今乐府序”。《吴赤溟集》。

吴炎欣然表示愿助好友完成此千秋大业。关于编史体例，吴、潘对两司马之书，取向略有不同。吴炎崇拜司马迁，曾谓“自司马子长氏没后，一千六百年而世遂无司马子长，可叹也！”^①他自己也曾有效仿司马迁，撰写《续史记》的计划，打算以“十一史为主，而野乘家传记事之书附之”，叙述西汉太初到宋祥兴年间的历史。《续史记》大概只完成了本纪本分，时间也只到唐代，其他则因吴炎“家贫书少，无从假观”而作罢^②。潘怪章推崇司马光，他认为“司马《通鉴》总荀袁诸氏之长，虽以质胜，要亦编年之善也”。潘怪章仿照司马光，不仅著有《通鉴后纪》叙述从宋到蒙古元朝的历史，而且还仿照司马光在撰《资治通鉴》之前先编《长编》的做法，完成了百卷《明史长编》。《明史长编》为后来的《明史记》打下了史料基础。[展龙、耿勇 2011] 由此来看，无论是吴炎，还是潘怪章，他们撰写《明史记》都不是空手而来，而是有所准备。吴炎劝说潘怪章放弃编年体，改守太史公之家法。吴炎认为编年体史书，往往一人一事跨越数世，“文易抵牾。义难综贯”，并且还不包括律历、兵刑等内容。因此自汉以来每朝正史一直遵从太史公之家法，本纪、年表犹如编年之纲，世家、列传为其目。体例商定之后，二人又确定了篇目，准备撰写纪十八、书十二、表十、世纪四十、列传二百。他们也仿司马迁当日《史记》的作法，“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取材于长编，而折衷于荐绅先生及士之能言者，以成一代之书”。^③

体例、篇目确定后，吴潘二人又是如何考订史料虚实的呢？吴炎对晚明人编纂的国史很是有意见，他在不同文章中都给与严厉批评^④：郑晓的《吾学篇》失之于简略，即使是描述位列朝中的名大臣，也只有“寥寥数言，殊不足示后世”。何乔远的《名山藏》，尽管“穷意披览，时时出己见，纵横论列，斐然成章”，但“喜采稗官小说，多诞罔不经，亦不得为信史”。即使是对明朝宰辅朱国祯的《史概》，吴炎批评起来越发不留余地，说他杂取百家、不加考证而成书，“彼此抵牾，前后倒置”，读几页就会让人昏昏欲睡，加之“掇拾浮屠氏唾余及委巷嘲詈之词形之于笔”，更使他的文章读来像是“为人作庆吊文，丐食不值一钱”。王世贞虽有才，却没有成书，窃取杨幼殷的《琬琰录》当做自己枕中秘笈，所作的世家、列传、表、志“芜蔓不称”，与司马迁相比，如同坐井观天^⑤。至于东南鳏生辈，“以传奇小说之伎俩，自诩董狐”，实际只不过是替几个权势之人作嫁，甚至不惜

① 吴炎：“上钱牧斋书”。《吴赤溟集》。

② 吴炎：“上钱牧斋书”。《吴赤溟集》。

③ 吴炎、潘怪章 1912。“吴子今乐府序”。《今乐府 2 卷》。

④ 见吴炎：“上钱牧斋书”、“答陆丽京书”。《吴赤溟集》。

⑤ 吴炎：“上钱牧斋书”。《吴赤溟集》。

诋毁故君，昧心逞能全不畏鬼神。这一番批判之辞不仅让人领略了吴炎纵横的才情，也看出了他继司马迁之后，续写一代史书的大志和能力。他与潘耒约定：“读史以国史、野史相证佐，为指摘其得失，阙疑存信”。^①

潘耒接受好友的建议，以《史记》体例编写他们的史书，只是在著述方法上，他还是谨守司马光的门径，他说：“著述之法，莫善于司马温公。其为《通鉴》，先成长编，别著考异，故少抵牾”，因此除了前边提到的《明史长编》，潘耒还著有《国史考异》。对史事详加考证的考据之风在明末已经颇成气候，王世贞的《史乘考误》、钱谦益《太祖实录辩证》、朱国祯的《史概存疑》都是本朝史事详加考证的成果。只是《史乘考误》仅仅是一个开端，尚未博考；《太祖实录辩证》只涉及洪武一朝，潘耒的考据时间跨度更大，也更有章法，“博访有明一代之书，以实录为纲领，若志乘，若文集，若墓铭家传，凡有关史事者，一切钞撮荟萃，以类相纵，稽其异同，核其虚实”[潘耒 2002，卷 6]。即便是自己视为纲领的列朝《实录》，潘氏也认为“有疏略与曲笔，不容不正”。他“参之以记载，揆之以情理，钩稽以穷其隐，画一以求其当，去取出入，皆有明征，不循单辞，不逞臆见，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应用如此绵密周详的考证之法，潘耒积累十多年之功力，数易手稿，成就了三十卷的《国史考异》。此书充分体现了潘耒“著述之指与裁择之苦心”，虽不是成史，“而做史之法具也”。《松陵文献》是《明史记》的副产品。“松陵”乃吴江别称，《松陵文献》即是吴江的地方史志。潘耒在博览前代史书、明朝实录、天下志乘文集之时，凡有一字涉及他家乡的即“钩摘疏记，积累成编”。《松陵文献》“订伪补阙，确有根柢，文辞简质，不事浮华，无溢美、无支离”[潘耒 2002，卷 6]，“其文直，其事核”。《松陵文献》每篇小小的人物传记都反映出潘耒是真正的良史之才。

中国传统中的史官历来被看作是“阎王殿里的判官”，于是那些历朝历代的大人物便有了对生前身后名的担忧与畏惧。吴潘二人的《今乐府》就是对有明一代历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品评和褒贬，它们也是吴潘二人最早面世的史学成果，大约刊刻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杜维运 1984，页 219]。吴潘二人各有所长：吴善言诗，长于叙史，是那种气势恢宏、诗情横溢的“才子型”人物，这从他批判别人的言辞就可以看得出；潘善谈诗，长于考订，是那种博览群书，穷究事理的“学者型”人才，他的《国史考异》便是明证。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他们选择明代赫赫有名，并且足以使后人感慨人物和事件，互为题解，托史于诗，

^① 吴炎.“答陆丽京书”.《吴赤溟集》.

以诗论史,著成了《今乐府》二编,其中有对阴谋篡位、擅权专政者的鞭挞,如《和尚误》、《客夫人》;有对贪官污吏的批判,如《罢南交》等;有对忠臣义士的表彰和歌颂,如《宁远捷》、《五人墓》和《杨漆工》;同时还有对底层人民生活的同情,如《采珠怨》[杨绪敏 2012]。《今乐府》引来了钱谦益的注意,看过此书后,他大喜过望,“深推其采摭之富,贯穿之熟,评断之勇也”,觉得吴、潘两位正是他期待已久的能“成我正史”的人才。^①《今乐府》成后半年,《明史记》的编纂也已过半,完成了纪十、书五、表十、世家三十、列传六十等篇目。

老年隐居的钱谦益对明史的纂修可谓寄情颇深。钱谦益明万历朝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神宗实录》的编纂。降清后又被任命为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清初开馆修明史,冯铨任史馆正总裁,钱谦益就是副总裁。不久他就乞归回乡,明史也没有修成。钱谦益一生常以史官自居,在与诸多朋友的书信往还中,他也总称“谦益,史官也”,或是“待罪国史”等等。晚年隐居之后,他更是希望自己能够履行史官之责任,完成一代史书。钱谦益为编明史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并且已经初见成果,可惜绛云楼火劫,他的“西京旧记,东观新书”具化为灰烬。钱谦益仰天大哭,灰心空门,从此“不复理世间文字六年”。半生辛苦最后付之一炬,确实让钱谦益大为灰心,可是他还是期待着有生之年能够遇到“左马班范”一类的青年才俊,能够看到故国史书在他们手中完成。对于钱谦益,最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是“于万历、天启、崇祯年间,钱氏名列东林,领袖清流,未尝为小人。甲申以后,俄而阿马、阮矣,俄而迎降清师矣,于是始为士林不齿。以钱氏垂暮之年,其仍贪恋人间之荣华富贵,声色犬马耶?抑另有其他隐情,不得不忍辱含垢耶?”有不少学者也曾为其寻各种理由加以开脱,凌凤翔“序有学集诗”则说:“已而权奸下石,身幽囹圄,以垂白之老,苟延残喘,其受桎梏之辱而不辞者,以曾在史局撰神宗实录,自任一代文献之重,未藏名山,而传诸其人,如司马子长所云,则一死所系,岂等鸿毛哉?”凌凤翔以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史记》之事为钱谦益晚节不保作托词,也有几分道理[参考杜维运 1984, 页 223-233]。自己的希望与努力都落了空,《今乐府》让钱谦益再次燃起了希望,这次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吴潘二人身上。按说钱谦益当时已经是位高年尊的大人物,可是他在给沈祖孝的信中不仅极力夸赞《今乐府》,甚至还降尊表示“不却狂愚,欲为接引”的意思。沈祖孝也是惊隐诗社的成员,与吴炎、潘耒的交往密切。

因为讨厌与那些沽名钓誉之徒为伍,吴炎起初并没有打算去拜访钱谦益,直

^① 钱谦益.“附钱牧斋复书”.载《吴赤溟集》.

到他在朋友沈祖孝的案头看到钱谦益这封信，他才下决心给这位“天下斯文之宗主”的老前辈写信求教。吴炎的这封《上钱牧斋书》写得真是气贯长虹、言辞恳切，他开门见山就表明了对司马迁的推崇，然后前批《史记》之后的历朝正史，后驳各家编纂的本朝成书，陈述了崇祯朝史事“十不得一二”的原因，提出了向钱谦益借书的请求。^①吴炎的来信让钱谦益很感动，尤其对吴炎“慨然以不朽大业下询陈人”更是感激不尽。钱谦益在回信中表达了与吴、潘二人促膝讨论的愿望，并且欣然应允将绛云楼残存的典籍尽付吴炎。对两人完成《明史记》的期待，钱谦益尤其迫切，甚至说：“倘不即死，于吾身亲见之，朝睹杀青，夕归黄壤，不致魂魄私恨无穷也。”^②

如果说《今乐府》让钱谦益看到了希望，而潘耒章的《国史考异》则让他树立了信心。潘耒章不仅与钱谦益有书信往还，还曾登门拜访过他，去时便带了《国史考异》。钱谦益盛赞《国史考异》“援据周详，辨析详密，不偏主一家，不偏执一见”，他给潘耒章回信说：“知史事之必有成，且成而必可为可信可传也。”身为前朝史官，钱谦益半世编摩，头白汗青，却一事无成，老来能见吴潘两位俊才承担起这一责任，怎能不让他激动莫名？事实上，潘耒章的《国史考异》有不少地方是批驳钱谦益的《太祖实录辩证》，而他却丝毫不以为忤，反而支持潘耒章把《太祖实录辩证》中的错误从头厘正，以免贻误后世。在这位老前辈面前，潘耒章也不谦虚，书信辩难，毫不客气。以德庆侯廖永忠沉韩林儿一案为例，钱谦益认为此事是太祖定案，宁王奉命编辑，最为郑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潘耒章却“执据坚确”，不做让步。最后钱谦益只能表明，此事乃开国大事，且大书简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潘耒章的看法。^③老有老的厚与重，少有少的勇与直，钱谦益与潘耒章之间的这段史学辩难也可算得上中国史学上的一段佳话，由此更见潘耒章对国史的谨慎及其不轻易苟同权威的精神。

顾炎武也时时关注着《明史记》的编纂进程。顺治十三年（1656年）顾炎武与潘耒章在南京不期而遇，顾炎武写下了长诗《赠潘节士耒章》，勉励潘耒章完成《明史记》。顾炎武在诗中追述了祖父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崇祯十七年，共计二十四年间抄录邸报的事情，也提到了自己对国史研究所做的诸多努力。顾炎武的祖父顾绍芾生于仕宦之家，年轻时随父亲居官各地而游历了不少地方，对朝中典故都很熟悉，老来隐居乡野，日夜悬心的也是朝廷大事，每阅览邸报，就会随

① 吴炎·“上钱牧斋书”。《吴赤溟集》。

② 钱谦益·“附钱牧斋复书”。载《吴赤溟集》。

③ 见钱谦益1996.卷38.“与吴江潘力田书”，卷39“复吴江潘力田书”。

手抄录下来，“皆细字草书，一纸至两千余字”，二十年不辍。他还教诲顾炎武要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在祖父的影响和教诲之下，顾炎武自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之后，就开始阅读本朝邸报，于“庚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至戊辰（崇祯元年，1628年）邸报皆曾寓目”，对泰昌以后的史事已经大致清楚和了解，并且还著有《熹庙谅阴记事》、《三朝纪事阙文》《圣朝纪事》、《圣安纪事》等有关明史的著作。其中《熹庙谅阴记事》是根据祖父手抄的邸报，再购买了天启以来其他人家所收藏的邸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本朝大事。此书差不多已经完稿，完稿后即被潘柽章借走，同时出借给潘柽章的还有家中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杜维运 1984，页 132-136]。读顾炎武的《赠潘节士柽章》一诗犹如读史，它将明末纷乱的社会局面、顾氏祖孙为明史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潘柽章的才华尽流于笔端。

北京一崩渝，国史遂中绝。二十有四年，记注亦残缺。中更夷與賊，出入互鞶縶。亡城與破軍，紛錯難具說。三案多是非，反覆同一轍。始終與門戶，竟與國俱滅。我欲問計吏，朝會非王都。我欲登蘭台。秘書入東胡。文武道未亡，臣子不敢誣。窈身雲夢中，幸與國典俱。有志述三朝，並及海宇圖。一書未及成，觸此忧患途。同方有潘子，自小耽文史。拳然持巨筆，直溯明興始。謂惟司馬遷，作書有條理。自餘數十家，充棟弟為爾。上下三百年，粲然得綱紀。……期君共編摩，不墜文獻迹。便當學殘書，過爾溪上宅。[顾炎武 1983，页 471]

感激于顾炎武的看重与期许，潘柽章也写下了《赠顾宁人》诗一首。

相对何须学楚囚，便當戮力向神州。但令舌在宁论辱，除却天崩不是忧。意气自惭河朔侠，行藏谁识下邳游。感君国士深期许，事业千秋尚可酬。[周可真 1998，页 203]^①

完成这样大部头的国史仅凭二人两人力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史记》之立《天官书》、《历书》、《律书》等篇，开创了历代国史记载专门之学问的先河，这部分内容非有专门知识之专门人才不能胜任。这部分内容的撰写落到王锡阐身上。王锡阐自幼耽于历算之学，“凡象数声律之学，他人苦其艰深纷赜，望崖而返者，君独殚精研究，必得肯綮而后已。尤邃于历学，兼通中西之学，非徒习其法，而能心知其意；非徒知其长，而能抉摘其短。……盖古落下阍、张平子、僧一行之俦^②”。当年编《明

^① 关于潘柽章这首诗的写作目的和时间各家说法不同，本文根据周可真的结果，认为它是潘柽章回赠顾炎武的诗，其中的“事业千秋”指完成《明史记》一书而不是指反清复明的斗争。

^② 潘耒：“晓庵遗书序”。卷六。

史记》，吴、潘、王三人一心，各有所能，将全部的热情都投入其中。王锡闳长期坐馆潘家，教潘恮章的异母弟潘耒学习历算，与潘耒名义上是朋友和师生关系，实则情逾骨肉。至庄氏史狱案发时，王锡闳已经完成了《明史记》中的十表，创作了乐府诗若干，只是王锡闳厌恶浮名，不肯付梓[柳亚子1994，页192]。《晓庵先生诗集》中保留有《国有君》、《战城南》等议论明朝政事的诗文，恐怕就是当年几人在作史讨论的结果。

明朝之灭亡，亡于流寇遍布，从其起事到最后灭亡前后二十余年，应该有专门之书来追寻其始末。《明史记》遂有《流寇志》一节，由戴笠分撰。崇祯一朝还没有《实录》成书，戴笠将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的邸报，大臣的奏章和一些私人记载采辑成书，用编年体，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史事，纤毫不漏。遵循司马光做的方法，“先从目，次长编，后《通鉴》，提纲缀目，有条有理”，关于李闯等流寇的“出入去来，盛衰分合”十分清楚，“实史家之要书”。戴笠去世后，潘耒整理其遗稿，吴乔略加删繁，成《寇事编年》18卷付梓刊刻。吴梅村看到此书，感慨地说：“志寇事自当以编年为正，恨见此书晚耳。”[谢国桢2006，页203]

私家修史最难得的是获得足够多的史料资源，吴潘二人私修《明史记》，最难得的是购买《明实录》。这部朝廷密档，“卷帙重大，非士大夫累数千金之家不能购”[顾炎武1983，页114]，潘恮章以变卖良田最终购得。潘恮章不事稼穡却能重金购书，全靠母亲留下的产业和他出身于富贵之家、“勤敏孝恭”的夫人秦氏的倾力相助。秦氏早逝，吴炎连撰三篇祭文表彰她的贤德，其中一篇描述了潘恮章鬻产购书、广交好友，而秦氏夫人毫无怨言，倾其所有帮助丈夫的事，读来让人感佩。

力田性好书。书贾有人间未见本，则昂其价走力田。力田必欲得书，辄斥善田而贺之。嫂闻未尝有愠色。力田又好游，每出门或连月累日不归，所持中装，往往质嫂嫁时簪环，费尽而返。嫂辄迎劳得佳书否？晤良友否？余一切不问。力田尤好客，又不能宿戒，具嫂阴储之以待客……。故力田产日益落，积书日益多，游日益广，客来日益众，文章气谊浸浸满天下，而嫂亦倦少且病。嫂虽病犹强起，为力田游治装、客治餐，未尝言病。力田亦浸忘之。而嫂竟以善病逝矣。呜呼！以嫂之贤，而天不肯少辽缓数岁之期，以佐力田之书成，而俾之以内顾之忧也。^①

除了购买与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的慷慨捐赠，还有陈济生、江阴李逊之他们

^① 吴炎.“祭秦孀人文”.《吴赤溟集》.

都对前朝掌故颇为熟悉，并且家中藏书很多，闻炎、桎章作史，亦并出以相佐，甚至于吕留良也曾给他们借过书，事后吕留良还向两家求其遗稿，两家惧祸，遗稿都被烧了。从吕留良家中藏书甚富，并且后来确实保留了吴炎部分遗稿来看，这事亦有可信之处。[转引自金性尧 1999, 页 24] 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如果没有后面的飞来横祸，世人就有可能看到一部能与《史记》相比肩的《明史记》，钱谦益这位“待罪国史”的前朝史官也可以含笑九泉了。这场飞来横祸就是发生在康熙初年的庄氏史狱。

三 庄氏史狱

庄氏史狱号称“清初三大大文字狱”之一，其大致过程是明首辅朱国祯去世后家道败落，他的儿孙将其所编《史概》手稿卖给里人庄廷鑑。庄廷鑑家里颇有资产，但自幼失明，乃仿左丘明盲而著《左传》之做法，召集人手，以《史概》为底稿撰写前朝史书。顾炎武也曾受其邀请，只是顾炎武鄙薄庄廷鑑的不学而没有参与这件事。书成尚未付梓，庄廷鑑就死了，其父庄允城怜惜儿子苦心，遂将其付梓刊刻，名曰《明史辑略》。书中颇多违禁犯上、谩骂当朝之语，无耻小人吴之荣看在眼里，以此蔽诈庄允城。允城不许，吴之荣告官，几经反复演变成了牵连两百多人的大惨案。庄氏史狱案发在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二年（1663年）案子始决，庄氏家族昆弟子孙年十五以上者均斩，妻女配沈阳披甲为奴，江浙地区的七十余名文人、名士受其牵累，或被凌迟、重辟和被处以绞刑，再加上书商、刻工和一些地方官员，死难人数共计有二百多。

吴炎和潘耒对庄廷鑑的《明史辑略》并不曾过目，吴炎还痛批过庄廷鑑不学无术，然而两人却因为名重一时，被参列其中才及于难。在庭审和狱中，他们一个大骂不止，当堂不跪，一个饮酒遣愁，赋诗不辍，二人英风烈烈，视死如归，于康熙二年六月死于杭州弼教坊。庄氏史狱给《明史记》纂修带来了灭顶之灾，已成的部分遭到焚毁，两人的其他著作或是被毁板，或是被查抄。这真是一场惨烈的文化屠戮！史狱之后凡涉及明末史事的书籍被人争相焚毁，甚至连收藏有关史事书籍的人，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给有志修明史的士人更是带来强大压力，时人视明季史书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闾红柳 2007, 63 页]。因为这场史狱的冲击，还有清廷对江南士人的压制更趋严厉，颁布了禁止文人私自结社的禁令，惊隐诗社最后也解散了。

与庄氏史狱牵连颇深的还有王锡阐。王锡阐居住的震泽镇与南浔镇两地相距不过十里，王家的母系亲属有好几位就来自于南浔庄家。王锡阐生母庄氏，育有三男二女，王锡阐排行第二，一女名王锡蕙。王锡阐原配夫人庄氏，出身南浔的名门望族并和王家是世代姻亲，妹妹王锡蕙，贤淑聪敏，深受王锡阐的喜爱，自幼许配庄济。庄济字日鳞，乃廷鑑兄弟廷鑑的长子，年少有才，十三岁即补博士弟子员。史狱发生后，庄廷鑑被判处死，狱中与吴潘饮酒赋诗，后与两人一同罹难[顾颉刚 1987, 页 157-161]。庄济被判流放沈阳，锡蕙日夜啼泣，屡次寻死。同里人沈谦见此情景，远赴沈阳，踏冰雪、设奇谋救回了庄济。庄济即入赘王家，并改名王济。王家与庄家这种世代姻亲的关系也让王锡阐忧戚不安。好友和庄家人被关押在杭州时，王锡阐还僧衣僧帽前往探监。吴炎、潘怪章的惨死被王锡阐引为生平大戚，他以《弼教坊二首》、《挽潘吴二节士》哀悼两位挚友，以《齐化门五首》和《广宁城》和纪念吴、潘两位夫人。

吴、潘遭罹难时，顾炎武在山西太原。听闻死讯，他在旅舍遥祭两位挚友，写下了《书吴潘二子事》，详细记述了吴、潘二人为亡明修史付出的艰苦努力、庄氏史狱发生的前因后果，为这桩震惊朝野的文字狱留下了最真实的记录。顾炎武还赋有《汾洲祭吴炎潘怪章二节士》诗一首，诗曰：

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

诗中表达了对两位挚友惨死的悲叹！在顾炎武看来他们不仅具有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史才，而且还具有潘综、吴途那样的人品。诗中同时还流露出要寻访他们遗书的愿望，这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寻访《明史记》的下落。除此之外，顾炎武还给潘怪章的异母弟潘耒写了首诗：

笔削千年在，英灵此日沦。犹存太史弟，莫作嗣书人。门户终还汝，男儿独重身。裁诗无寄处，掩卷一伤神。

诗中劝潘耒要以潘家门户为重，再莫要做读书人。终生以读书为业的顾炎武却劝潘耒不要读书，而他自己此后十七年也绝口不提为明修史的事情，其伤感忧惧之情由此可见一斑。顾炎武这首诗因投寄无门而没有寄出，此时，17岁的潘耒正在护送身怀有孕的嫂嫂和两位年幼的侄子前往发配地的道中。潘耒没有收到顾炎武的诗，因此也无法听取顾炎武的劝，还是作了读书人。康熙八年(1669)，潘耒北上受学于顾炎武。康熙十八年(1679)，朝廷下博学鸿儒诏，潘耒等143人“召试体仁阁下，擢二等第二，除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无论是潘耒以不得已之情由入明史馆参修《明史》，还是潘怪章以私人之力撰写《明史记》，至少在为

亡明存史这一点上，他们两兄弟做的是相同的事情。

四 潘耒修《明史》与《明史记》残稿

潘耒入仕清朝让众多师友非常失望。尤其是王锡闾，为劝止潘耒北上，与他闹到几近决裂的地步。王锡闾《送潘次耕之燕二首》其中一首曰：

无计邀君缓客舟，临歧尚许赠言否？从来总被虚声误，此去休教只字留。

纵有千钟糜国士，岂堪一日负前修。还期寒食同携酒，痛哭钱塘原隰哀。

诗中提醒潘耒莫忘长兄之痛，进京之后收敛才华，勿留只言片语，以免貽误终身。此后王锡闾在给潘耒的几封去信中，以“失路之悲”、“孝悌之义”规劝潘耒更是必有之内容。王锡闾还致信顾炎武，希望他以师生情谊劝潘耒早归吴门，以慰高堂老母^①。顾炎武对待潘耒入仕的态度要比王锡闾平和、通达些，但也是失望与无奈、担忧与惋惜之情并举。其实早在清廷鸿博征诏初下，顾炎武还不知道潘耒是否在荐举之列时，他就给时在吴兴坐馆的潘耒写信，劝勉他要以陈亮工为戒，切毋热中干禄，而要“时归溪上，宜常与令兄同志诸友往讲论”。潘耒即刻向顾炎武表示自己会“坚隐不出”，并采取了“奉母以远行，不知所往”的行动。顾炎武对潘耒的举动表示满意，在给友人的信中盛赞潘耒道：“干木逾垣之志，介推偕隐之风，昔闻晋国，今在吴门矣。”可惜潘耒终被诏书所驱，仓皇就道。顾炎武得知潘耒抵京非常失望，寄诗质问他：“何图志不遂，策蹇还就征？”潘耒入仕已经是无可挽回的事情了，失望之余的顾炎武，又转托京中老友李因笃提携他，同时继续劝勉他“自今以往，当思中材而涉末流，处钝守拙”，同时让他谨记“有名不如无名，有位不如无位”[陈祖武 2010，页 144-153]。王锡闾与顾炎武铭记潘恂樟当年惨死的经历，拳拳护持着潘家这根独脉。

入明史馆参修《明史》给了潘耒展示才华的机会，在朝中他“精敏敢言，无稍逊避”，全然忘记了王锡闾对他“此去休教只字留”的忠告，也没有遵守顾炎武让他“处钝守拙”的训诫。潘耒那篇著名的《修明史条约》，张舜徽评价道：“揭橥数事曰：‘搜采欲博，考证欲精，任职欲分，义例欲一，秉笔欲直，持论欲平，岁月欲宽，卷帙欲简。’指陈前代修史利病，至为明晰。尤非精熟旧事有高识宏裁者，不能道也。”[张舜徽 2004，页 83]《修明史条约》恐怕大受兄长潘恂樟的影响。关于“搜采欲博”，潘耒认为史书取材应该尽量广博，做到“琐细庞杂，不厌其

^① 王锡闾。“与潘次耕书”，又（上章 滩）。卷二。《晓庵先生文集》。

详”，“博采网罗，不遗余力”，所谓“木石具而可以筑室，缣素具而后可以缝衣”。在博采的基础上，又必须对材料加以精审的考核，做到“参伍众说，归于一是，乃可下笔。”因此为了能够尽可能低搜集明朝史料，他还建议朝廷下求书令，遍征天下遗书，或责成各省督抚学臣采访进呈，充入秘府和史馆，这后来成了乾隆朝纂修《四库全书》的起因。潘耒还把“作史”与“治狱”类比，指出：“作史者，一事不核其实，则溢美溢恶，而万世无信史”。潘耒坚持认为：“史家大端，在善善恶恶。”秉持这样的修史目的，在史馆修史期间，潘耒坚持规避亲朋，不徇私情，许多朋友和乡里请求潘耒表彰祖先，潘耒一概断然拒绝。[叶建华 1994]

正是出于作史需要广征博采的考虑，康熙十八年腊月潘耒两次致信王锡闾，一方面询问亡兄遗稿和王锡闾所著历书的下落，一方面向王锡闾请教当年他们共著明史的情况。次年正月十日王锡闾给潘耒回信，首先表达了他与潘耒的关系已经是出处异途，如形影之相离

腊月两接手教，知旅邸和畅，锐志史事，追忆写怀佳什，真所谓情随事迁，令人感慨系之。昔与愧庵（吴炎）、观物（潘耒），三人一心，与次耕、参隐，名则友生，情逾骨肉。愧庵、观物，俟已千古；参隐复早世。我二人仅存，而又出处异途，如形影之相离也。屋梁落月，拊枕太息，为我友熟筹利害，不得面相祭，故敢托诸短笺。

潘耒对“良史”问题的请教，王锡闾则回答：

故知良不良，在乎幸不幸，不在义之正不正，事之核不核也。史无定例，例贵从时，□□□□，而次耕思以立言自寿乎？据弟愚见，妥欢之胤，尚有二世，孝陵似当逊彼一筹。万历年年□□□□，便宜绝笔；泰昌，启，顽悉可抹倒。何况渡江之后，欲为中湘、稼轩并传，尤非急务。虽由次耕而名正论定，恐非在天之灵，与殉义诸公所乐闻也。况乎□□□□□□，而争此不足争之事，纵不为妻子计，不虞为垂白累乎！念之股栗。

王锡闾的这一番议论恐怕与吴潘当年编写《明史记》的主张已经大相径庭了。他劝潘耒要安身自保，为妻子的安危考虑，而不要去争那些不足争之事。

潘耒提出索要王锡闾和潘耒残稿与书籍时，王锡闾大为光火。

十表向系弟手笔，病中同诸钞本，尽为妄人窃去；觉而赎之，仅得皇极祝氏鈔六册，余皆不可复问矣。当日所据书，前则实录，后则邸报，参以先达，成书数十余种，非一狐之腋。惜于癸卯已尽散佚。他若史料、《史概》之属，世尚多有其书，而抵牾特甚，未足依赖。盐官之《国权》，浙东之《朝野汇编》，

并有可采。愚赏购之，其书自至。往者每恨无力得书。今以天下之力，求天下之书，何艰何疑，而问之竹头木屑间哉！^①

王锡闳的这番言语“辞气愤厉，不可方物”，其恼恨潘耒忘却家国仇恨，效力仇讎的愤怒丝毫未减。尽管潘耒在明史馆修史不徇私情，但是在潘耒求教于王锡闳并向他索求书稿这一点上，不能排除他希望兄长、吴炎、王锡闳这些真正的忠烈之士名垂青史的想法。

同年，顾炎武也接到了潘耒的求教信，他随即回信道：

吾昔年所蓄史事之书，并为令兄取去，令兄亡后，书既无存，吾亦不谈此事。……令兄之亡十七年矣，以六十有七之人，而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衰耄遗忘，少年所闻，十不记其一二。[顾炎武 1983，卷四]

顾炎武的回信平淡中却透出一种更深的伤痛。顾炎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章学诚认为清朝学问几乎没有不以其为渊源的，至于史学则是开辟了考据史学的先河[内藤湖南 2008，页 237-240]。有考据史学开山鼻祖之称的顾炎武却“十七年不谈旧事，十七年不见旧书”，更何况这其中还有他祖父手抄明邸报二十多年的辛苦，他自己少承祖父之教诲熟读本朝邸报之努力，他却坐视这些故国记忆流失而不顾，这恐怕是庄氏史狱，吴、潘惨死，《明史记》中辍而造成的直接影响。

就在王锡闳严词拒绝了潘耒要求之后的六个月，他的几位门生差不多已经整理完毕藏在王锡闳处的潘怪章史稿。吴炎的手稿保存在吕留良家中。此时王锡闳与吕留良交往已久，于是王锡闳致信老友吕留良，请求他能够出借吴炎稿本，以便供将来有志修明史的人参考。康熙十九年六月，王锡闳致信顾炎武，信中谈到了几位朋友整理吴、潘遗书的打算，吕留良答应出借吴炎手稿以及潘耒向他索要遗稿等事情。在说到潘耒时，王锡闳还是气愤难平。《明史记》是吴潘两人一生的事业，历经“劫火之余，略存百一”，王锡闳不忍心看着亡友遗稿再次散佚，只是他外不敢公开求书，内又有饥寒之迫，不能专心做这件事情。门人虽有心却无力，如果能得顾炎武的指导之间，《明史记》残稿的整理便有可能完成。因此王锡闳在听说顾炎武南返之意，他的期盼更甚，“若得搯臂联床，摠二十年积愆，论十九叶污隆”，就是对二位亡友最大的告慰。^②可惜，顾炎武不仅南返无期，还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病逝，同年王锡闳病逝，第二年吕留良病逝，《明史记》再无下落！

① 王锡闳。“又（上章 滩）”。卷二。《晓庵先生文集》。

② 王锡闳。“又与顾亭林书”。《晓庵先生文集》

潘耒在京为官五年，期间除参修明史外，他又被康熙帝亲自简拔为日讲起居注官，成为康熙帝的近臣，他还出任会试考官，分校礼闱，其于时政亦多有建白。康熙二十三年（1684），由于遭人弹劾，又突遭母丧，潘耒辞官回到了吴江。四十年余后《明史》基本修成，在这部清修《明史》中，潘耒的贡献恐怕仅止于《修明史议》和《食货志》了。康熙二年（1633），潘耒奉母避祸上沙山中之时，曾拜隐居于此地的徐枋为师。徐枋，字昭法，号俟斋，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国变后隐居上沙山，二十年不入城市，二十年不出庭户，终其生以鬻画自给。潘耒归吴求见这位恩师，跪门外三日才允许进门，奉赠一砚，涕泣请收，徐枋命其悬之梁上，以示不用！[严迪昌 1990，页 270]潘耒为什么忘却国仇家恨，抛开诸多师友之规劝而入仕，这其中固然有不得已之原因，恐怕继承亡兄遗志，完成一部保留故国记忆的史书也是其重要情由。

一部《明史记》，让如此多的人牵心挂怀，甚至不惜身家性命，而这部史书最终也没能面世。在中国学术史上，这样结局的书籍不知有多少？

参考文献

- 陈和志、沈彤清.《乾隆震泽县志》.光绪 19 年
- 陈美东、沈荣法 2000.《王锡闾研究文集》.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陈祖武 2010.《顾炎武评传》.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杜维运 1984.《清代史学与史家》.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 杜维运 2010.《中国史学史·第 3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顾颉刚 1987.《苏州史志笔记·王煦华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顾炎武 1983.《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 顾炎武 1983.《顾亭林诗集汇注》.王蘧常辑注.吴丕绩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金性尧 1999.《土·中·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闾红柳 2007.庄氏史狱与清初私家修史：从史学史的角度分析庄氏史狱对清初文化的影响.《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10.
- 柳亚子 1994.《柳亚子文集·明史纲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潘怪章 1995.《松陵文献十五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 潘耒 2002.《遂初堂文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17-14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钱茂伟 1994.论晚明当代史的编撰.《史学史研究》.2.
- 钱茂伟 2003.《明代史学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钱茂伟、柴伟梁 2006.《遗民史家谈迁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钱茂伟 2010.《明实录》编纂与明代史学的流变.《学术研究》.5.
- 钱谦益 1996.《牧斋有学集（下）》.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锡闾.《晓庵先生文集》.道光元年刻本.
- 王锡闾.《晓庵先生诗集》.光绪 9 年刻本.

- 吴航 2008. 清初学人潘耒述论. 云南师范大学.
吴山嘉 1990. 《复社姓氏传略·卷二》. 北京: 中国书店.
吴炎. 《吴赤溟集》. 陈去病辑. 国学保存会印行. 光绪 32 年.
吴炎、潘耒 1912. 《今乐府 2 卷》. 清抄本. 上海: 上海国粹学报社.
谢国桢 2006. 《明末清初的学风》.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严迪昌 1990. 《清诗史 (上)》.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杨绪敏 2012. 论吴炎、潘耒与《明史记》的纂修. 《史学史研究》. 2.
叶建华 1994. 论清初明史馆馆臣的史学思想. 《史学史研究》. 4.
展龙、耿勇 2011. 《明史记》编纂考论. 《图书馆界》. 6.
张舜徽 2004. 《清人文集别录》.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震泽镇, 吴江市档案局 2009. 震泽镇志续稿. 扬州: 广陵书社.
周可真 1998. 《顾炎武年谱》.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An Unfinished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NING Xiaoyu

Abstracts: A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明史记) is an unfinished and unpublished historical work.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is comprehensive work from beginning to end, including Wu Yan and Pan Chengzhang' s contribution, Qian Qianyi and Gu Yanwu' s expectation,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ences and discussions between Wu, Pan and Qian. The article also reveals the great effort of Wang Xichan and Lu Liuliang for saving and editing this unfinished work after Wu and Pan were involved with the Sentence for Zhuang' s Private History Writing (庄氏史狱).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reason why Pan Lei agree to join the Qing' s Bureau for Writing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despite the violent opposition both from his family and from his friends.

Keywords: A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Wu Yan, Pan Shengzhang, Wang Xichan, Gu Yanwu